

文史知识

6

奴隶制时代的中国

周谷城

我看先秦文学与《礼记·檀弓》

杨伯峻

先秦学术思想漫谈

梁漱溟

关于周公「制礼作乐」

杨向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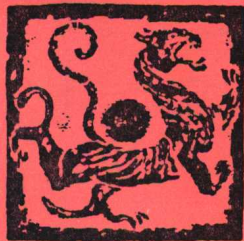
先秦婚姻说略(上)

许嘉璐

为什么说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摇篮

唐嘉弘

1986



WENSHI ZHISHI





医药学院610 2 01478498

文史知识

1986年第6期

(总第60期)

先秦专号(下)

奴隶制时代的中国

周谷城 3

• 治学之道 •

我看先秦文学和《礼记·檀弓》

杨伯峻 9

先秦学术思想漫谈(兼谈我的自学)

梁漱溟 15

• 文学史百题 •

中国古代神话中的悲剧美和崇高美

褚斌杰 20

• 历史百题 •

关于周公“制礼作乐”

杨向奎 26

由“学在官府”到“私家之学”

刘泽华 32

• 怎样读 •

《吕氏春秋》的美学思想

敏 泽 38

诗 文 欣 赏 孟子的文论

周振甫 43

善与美的统一——读《诗经·桃夭》

杨牧之 48

有济世之心 尚须有济世之术

——读《战国策·触龙说赵太后》

韩兆琦 52

• 文史书目答问 •

我国古代盟誓制度的历史见证——侯马盟书

李裕民 56

郭沫若在先秦史研究上的贡献

黄 烈 60

《古史辨》派与先秦史研究

王熙华 64

文化史知识	中国歌舞的起源	常任侠	69
	先秦婚姻说略(上)	许嘉璐	74
	先秦时期是如何记时的	宋镇豪	80
	商代的都邑	杨升南	85

人物春秋	西周开国功臣太公望	盛冬铃	91
	孔门弟子(一)——端木赐、仲由、冉求	曹道衡	97
	伍子胥的悲剧	张习孔	103

成语典故	多行不义必自毙	高山	109
	处心积虑	谷雨	110

• 文史信箱 •

为什么说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	唐嘉弘	112
------------------	-----	-----

• 文史古迹 •

孟子故里史迹多	骆承烈	117
---------	-----	-----

• 文史研究动态 •

宗法制研究综述	晁福林	122
---------	-----	-----

• 补白 4 则 • 后夔典乐图(8) 古代以酒治病(19) 名句选登(73)(79)

悦其名而丧其实(84) 伍子胥画像镜(96)

后夔典乐图(封二)	孟子故里(封三)
-----------	----------

封面设计 王增寅

奴隶制时代的中国

一、奴隶制时代的基本特征和我国奴隶制时代

一个社会究竟具备一些什么条件，才算奴隶社会？照恩格斯的著作看，首先要有农业与畜牧业的分工，接着是农业畜牧业与手工业的分工，最后是农业、畜牧业、手工业与商业的分工，商人阶级的出现。商人阶级独立出现之日，便是奴隶社会成熟之时。世界古史上的奴隶制时代的许多特征，可大致归纳如下：（一）铁的使用；（二）农业及手工业的进步；（三）城市工商业的发达；（四）自由竞争的激烈；（五）奴隶阶级与奴隶主阶级的尖锐对立和贵族奴隶主与工商奴隶主（即平民）的斗争；（六）法或法制的出现；（七）宗教经典的形成；（八）学术上的百家争鸣的激烈；（九）统一集权帝国的出现；（十）封建等级国的出现和没落。所有这些，在封建制时代未必完全没有，但第一次达到全盛，却在奴隶制时代。

关于我国的奴隶社会，我认为，不妨以公元前2200年夏朝开始之年为始，到公元二世纪下半期的东汉后期为止。这样讲，是不是有理由呢？从社会发展史的一般规律看，就封建剥削的明确证据讲，我认为把封建社会的起头放到东汉末年是有根据的。

现在主张中国封建社会开始于春秋战国之交的，有两个较为流行的理由：一是公室废，私门兴；我看这个理由只能证明贵族奴隶主的没落，和工商奴隶主的兴起，而不能证明封建时代的开端。公室废，即贵族奴隶主的没落，是没有疑问的。而私门兴，就不太简单了；“私门”可能是封建地主；也可能是工商奴隶主。两者都是“私门”。就《史

记·货殖列传》所列举的范蠡等九人看，几乎都是工商奴隶主。二是鲁宣公时初税亩，其实这个理由只能证明政府向奴隶主征税，而不能证明地主向农民收租；而且税额很低，即什之一，更不能证明是封建剥削。要证明封建剥削，《汉书·食货志》里有一句话说：“小民……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对这句话，如淳说“什税其五”，颜师古说：“言下户贫人自无田，而耕垦豪富家田，十分之中，以五输田主也。”这即是百分之百的剥削。封建的剥削，应以东佃间，或豪民与小民间的百分之百的剥削为标志。这样的标志，秦以前是没有的，至少没有明文记载；而在秦以后有了。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中国封建时代的开始，在东汉后期。

二、我国奴隶社会发展的大致过程

中国奴隶社会的发展，若着重政治方面，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一）王政时期，大约可定为公元前二十二世纪到公元前十二世纪的一千年，这一时期正包括夏商两朝。（二）贵族时期，约在周武王克商以后到春秋战国之交，即公元前1122年以后，到公元前480年左右。这时因社会经济的发展，酝酿出后来的所谓霸者。（三）霸政时期，春秋战国之交，奴隶主阶级出现了一种变化：一方面贵族奴隶主逐渐没落，另一方面工商奴隶主逐渐兴起；工商奴隶主是平民，霸者在这时，朝前看，重法轻礼，形成霸政，所谓五霸、七雄，都是霸者。（四）帝政时期，自七雄统一于秦，出现秦汉帝国；这一时期，统一集权国家发展过程已告完成，封建等级制也在这时大体结束。

三、奴隶主阶级内部之分类

前面讲了世界古史上奴隶制时代的一些特征。其中之一，都有贵族奴隶主与工商奴隶主（即平民）的斗争。这一特点，在我国以及希腊、罗马较为突出。奴隶社会的奴隶主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是贵族奴隶主，是打仗获胜，以战败被俘者为奴，而渐渐成长起来的奴隶主。二是工商奴隶主，是营业获利，以工商竞争失败负债者为奴，渐渐成长起来的奴隶主。两者的成长，都是由于生产的进步。而随着两者的成

长，又出现了这两者激烈的斗争。中国古史，自夏殷之际，到东汉末这一阶段，可以周平王东迁时为界，勉强划为前后两期。前期殷周时代，是贵族奴隶主占优势。后期战国秦汉时代，是工商奴隶主占优势。这一时期虽是部族战争频繁，被俘为奴的人加多；而战胜攻取的结果又常使小国并入大国。国土日大，交通方便，工商的竞争日益剧烈；竞争失败，转化为奴的人更多。春秋战国时代，富埒王侯，势倾人主的工商奴隶主渐渐多起来；所谓王侯或人主的数目随着国家之兼并，逐渐少起来；这便是由贵族奴隶主到工商奴隶主的转变。所谓“公室废，私门兴”，就是说以王侯人主为代表的贵族奴隶主日趋衰败，而以工商奴隶主为主体的“私门”，无论从政治势力，还是经济实力都对贵族奴隶主占有了优势。

四、我国奴隶制时代的封建制

世界古史时代的另一特点即是，都有封建等级国的出现，而且国家发展成为统一集权的坚强组织时，封建等级国即随着逐渐没落或完全消灭。这以我国、埃及、亚述、伊朗等国较为突出。诸国之中，我国封建等级最为明显。

周武王克商以后，为着要巩固周的统治，曾大行封建。这种封建，即封土建国的意思。封土，就是把一定的土地分赐给某些贵族奴隶主，尤其是分赐给过去一同作战有功的贵族奴隶主；其中包括同姓的亲，异姓的戚，或单纯有成功的人。依其地位之重要与否，分成大小等级，遂成公侯伯子男等等的封建制。

而这种封建制，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制度呢？我认为周初的封建制是部族战争过程中必然的产物，是贵族奴隶主成长过程中必然的产物；与奴隶社会以后的中世封建制截然不同。古代封建关系，是强大部族对弱小部族的关系；中世封建关系，是封建领主对农奴阶级的关系。古代封建是氏族社会没落后，部族战争演进的结果；中世封建是奴隶社会没落后，主奴关系再建的结果。这种奴隶社会内部的封建制，在古埃及有，布勒斯特氏称之为“古代封建”；在古亚述有，马斯伯乐氏称之为“军事封建”。这种封建制随奴隶制之没落而没落，与中世

封建是不相连的。在奴隶时代，具有一个成长、发展、盛衰、没落的完整过程。在王政时期，即已成长、发展；在贵族时期，达到全盛；因经济的发展，工商奴隶主的出现，贵族奴隶主渐渐衰微，这制度才随着渐渐趋向没落；到统一集权的所谓帝国出现之时，它就消灭。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早在贵族时期，因生产进步，工商发达，自由竞争激烈，统一集权的要求很强。于是有所谓霸者出。他们朝前看，重进取，顺应时代的要求，促成所谓霸政。强大的霸者终于把并立的诸国统一下来，例如：秦开始时，也只是所谓战国七雄之一。它能统一其他六国，有几个优越条件：一则当其他各国的贵族奴隶主已被奢侈生活所腐化而丧失统治能力时，它还是方兴未艾的新国。二则它是崛起于西戎之中的，受过游牧锻炼的最强者，很与崛起于希腊半岛北部的，受过游牧生活锻炼的马其顿人相似。三则它习见六国的腐化，起而改革内部，放弃礼治，力行最合时代要求的法治，颇与西方的罗马之所为相似。四则它有与六国不同的好东西：北方的马，巴蜀的铁，形便的地势。因此种种，它终于消灭六国，统一天下。中国古代贵族奴隶主的封建等级国，也就随着统一集权帝国的兴起，而基本结束。统一集权帝国兴起，贵族奴隶主的封建等级国即随着没落。印度的古史发展亦是如此。俨然象一条规律。

五、我国奴隶制时代意识形态诸方面

下面说说奴隶制时代意识形态方面的特征。前面说过，这一时期的世界各国都有宗教经典的纂辑，例如：印度的吠陀经典，中国的儒家经典，波斯的祆教经典，阿拉伯的可兰经典，西方的旧约和新约等。此外，还有法或法典、法家、法制的出现。例如：希腊霸政时期有法家，中国战国时期有法家，巴比伦有汉穆拉比法典，印度有婆罗门法典，罗马有法制和最严密的法学。

把中国的儒家学说与世界几大宗教逐一类比，也许有人并不同意。儒教究竟可不可算是宗教呢，我这里谈谈我的看法，中国的孔教或儒教总的看来是积极的，尊重现实的。其创始人孔子，是公元前551年到479年间的人。就他的中心思想“仁”来看，他应该是哲学

家。他提倡的“仁”的本意即“人人”，意思是人要象人，做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如果各与自己相反，便要“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同理，如果人不象人，那便一切都完了。故曰：“人而不仁（人）于礼何；人而不仁（人）于乐何。”孔子以“仁”或“人人”为思想依据，为言论中心，为行动准则；孜孜不辍，带领着几千弟子，向广大人民，主要是向贵族奴隶主或工商奴隶主的子弟说教。终其一生，席不暇暖，所有精力用于“救人”“救世”之中，生存一天，便努力一天，几乎不知老之将至。其精神颇象教主。至于由他整理的《诗》、《书》、《礼》、《乐》、《易》、《春秋》等所谓六经，内容也颇与古代世界其他经典相似。六经的意义，《庄子·天下》篇概括为：“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拿这些内容与古代世界其他经典相比，如与犹太的《旧约》、基督的《新约》相比，就可以发现许多相似点。因此把这些说成教典，把儒家说成儒教，亦无可。

各种宗教都成长于奴隶制时代，反映了奴隶制时代的种种现实，宗教如此，学术亦然。这一时期的世界各国都有学术思想的自由竞争和蓬勃发展。以印度佛之外的外道诸宗，中国诸子百家，希腊各派哲学最为突出，形成古代世界学术的三大源泉。单就中国讲，古代中国当贵族奴隶主得势之时，学问原在官府。当时学问与政事分不开，管政事的兼管学问，有学问的要管政事。当时保存学问，保存过去的经验，从事学术文化活动，仅在官府才有可能。在官府里把学问一代一代传下去的人叫畴人，或叫世官、畴官。春秋战国之际，贵族奴隶主逐渐没落，工商奴隶主逐渐兴起，官府以外过虚闲生活的人多了，学问才由官府下移民间，即由贵族奴隶主手里下移到工商奴隶主或平民手里。学问既到民间，随着工商业的日益发达，社会竞争的日益激烈，于是蓬勃发展。就派别讲，《汉书·艺文志》说：儒家大概出于古代掌文教的官；道家大概出于管历史记载成败祸福之官；阴阳家大概出于管历法授民时的官；法家大概出于管理赏罚，辅助礼制的官；名家大概出于礼官；墨家大概出于清庙之守，管理神事的。其他如杂家、农家、纵横家、小说家，无不各有来历；到工商业空前发达，在

工商奴隶主或平民手里，乃特别发展，成为不同学派，以适应时代的要求。各家大意，《汉书》所说未必正确；但有一点不能否认，即学问由贵族奴隶主手里解放出来以后，就蓬蓬勃勃发展起来。举其最突出者，有死守贵族奴隶主的老一套不放的儒家；有迎接工商奴隶主的新势力而飞跃发展的法家；有积极努力，着重功利的墨家；有消极无为，节制欲望，对激烈斗争的社会作釜底抽薪之想的道家等等。印度学术的发展至迟当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正当我国殷商时代。而希腊学术是在公元前四、五世纪及以后尤为发达，这里就不详述了。但有一点得指出，到中世纪希腊学术蓬勃发展的情况就衰落下来。中国亦是如此，汉代以后，原来蓬勃发展的情况逐渐沉没了下去。

上面讲了世界奴隶制时代的一些特征。这些特征在中国历史上的演进可以说是从夏殷之际开始，到东汉末年为止，颇成一个完整的段落。因此，我把我国封建时代的上限放到公元二世纪下半期，即东汉末。只有这样，中国奴隶制时代的种种特征才可以同世界古史上其他各国一样，保存完好。否则必须把这一切搬到封建时代，使我国奴隶制时代变得既短促，又空虚，在世界古史上成为一种反常现象。顺便指出，学术界流行着一种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特别长的观点，并群起探讨长期的原因。这是因为古史分期观点不同的缘故。如按我的分期，则封建长期，似乎不长。是否有理，质之读者诸公，以为何如？

后夔典乐图(封二说明)

此图选自清《钦定书经图说》。后夔是帝尧时的典乐之官。《史记·五帝本纪》载舜对夔说：“以夔为典乐，教稚(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毋虐，简而毋傲；诗言志，歌长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能谐，毋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所以，在上古传说中，夔实际上是我国音乐歌诗之祖。此图描绘的便是后夔教育歌诗乐律时的情景。

图中，在后夔的桌上放置着古琴及瑟，右手是笙、壎、篪，左手为箫、篴，殿后是编钟及球，殿前是编磬及鼓，后夔桌前地上放置着祝与歌，堂前坐着一群“胄子”，雍雍熙熙，庄严肃穆，俨然一幅教育歌诗乐律的想象图。(陈式)



我看先秦文学 和《礼记·檀弓》

杨伯峻

杨伯峻 湖南长沙人,1909年生。现任中华书局编审、北京大学历史系兼任教授、孔子研究会理事、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问。主要著作有:《论语译注》、《孟子译注》、《春秋左传注》、《列子集释》、《古汉语虚词》等。

先秦文学概观

先秦文学,根据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所编的《文选》,仅有《楚辞》中的屈原、宋玉的骚体以及宋玉其他作品和李斯的《上书秦始皇》(即《谏逐客书》)入选。萧统认为“经”书他不敢“剪裁”,史书又“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诸子则“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因之都不入选。这样,所选先秦作品寥寥可数,文学范畴未免太狭窄。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引孔子的话“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若由此推理,流传久远的作品,虽然未必尽是文学作品,但不少是有文学价值的。和《楚辞》相照应而作于屈原以前的《诗三百篇》,基本上应该纳入文学范畴。未尝不可说,《三百篇》是西周以至春秋,基本上是江汉以北的乐诗,《楚辞》则是战国时江汉以南的别出一格的骚赋。两者不同源,后代也异流,都成为中国纯文学中的瑰宝。

萧统把经、史、子和文学区别开来,从今天看,未必是科学的。韩愈作《进学解》,他便把经、史、子和扬雄、司马相如等量齐观,都作为他为文章的范品和源泉,早把文学范畴扩展了。所以我们谈先秦文学不能撇开经、史、子。

“经”书内容复杂,《易》的《卦辞》和《爻辞》,只是占筮的书,但是

西周初年的作品；《尚书》内容庞杂，简略地说，除伪古文之外，可说是古代文献汇编。这两种自当别论。《三礼》（《周礼》、《仪礼》、《礼记》），除《礼记》中若干篇章外，《仪礼》和《周礼》文学价值不大。《三传》中的《公羊传》和《谷梁传》不能算是先秦书，惟《春秋左氏传》，既是最早的编年史，又兼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为历代散文家的示范品。《礼记》中的《檀弓》也有些富于艺术性的小品叙事文。

《国语》是一部国别史，所叙事基本上同于《左传》，但文学价值大不如《左传》，有时写得臃肿拖沓，使人生厌。《战国策》也可以说是国别史，虽然司马迁作《史记》曾经用过它百〇五条的材料，但可信程度如何，还待认真研究评定。然而它的文学价值却高出《国语》。它基本上是记载纵横家说辞的书。纵横家富于机智，善于诡辩，而又文采绚烂，巧喻连珠，足以打动人心。宋代苏洵很得力于这书，苏轼也曾模仿过。

诸子固然“以立意为宗”，也不能不讲究文辞，不过有工拙的不同罢了。《墨子》失之板滞，可以不论。《论语》，西汉人便视同诸子，只是记载孔子和他门弟子片言只语的居多，偶然有较长的叙事小文，如《阳货篇》的“阳货欲见孔子”，《微子篇》的“楚狂接舆”、“长沮桀溺耦而耕”、“子路从而后”诸章，都是很简洁生动的小品。战国两大儒家，孟子和荀子都有著作完整地流传至今。以学术功绩论，荀大于孟，汪中《述学·荀卿子通论》已有论述。以影响论，则孟大于荀。比较两书，《荀子》理胜于文，《孟子》则文胜于理。孟子说他善养他的浩然之气，他的文章便气势磅礴。同别人辩论，与其说是以理服人，不如说是以气压人。后来不少文艺理论家和评论家如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刘勰在《文心雕龙·养气》中都把“气”提到很高地位。苏辙《上枢密韩太尉书》说：“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今观其文，宽厚弘博，充乎天地之间，称其气之小大。”便是加以肯定和赞许。战国晚期直到秦，《吕氏春秋》和《韩非子》都有不少好文章。而《庄子》的文章尤为特出。庄周看不惯当时现象，他要破坏圣人偶像，甚至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胠篋篇》），自然反对礼教，因对黑暗现实加以揭露，在庄子思想中这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总的说来，他有一个超脱时间和空间的精神幻境，他要求“无待”的绝对自由，追求排除相对的绝对平

等，然而那种境界是不存在的，那种要求或追求是不现实的，难以用一般道理说深说透，便以汪洋恣纵、千奇百态、滑稽突梯、嬉笑怒骂的文章从多方面表达他非一般言语所能说出的思想境界。辩论文字达到高峰，是极难学到的。苏轼的《志林》有人说是学《战国策》，我却认为是学《庄子》，可以说得其仿佛，东坡一生屡遭挫折，幸而学取到庄子的达观，就是贬谪到海南岛，也能自得其乐。我认为，只要不受《庄子》思想消极面的影响，《庄子》的文章是值得欣赏的。

先秦的作品距离今天多则三千有余年（如《尚书》中《周书》的一部分和《诗经》中《周颂》和《大雅》一部分），短也二千多年，声音、文字变化很大，词汇也有新陈代谢和发展，语法自然也有同有异。至于修辞，更各具特色。尤其是礼仪、风俗，古今大不相同；古人认为极平常的事，今日看来似乎有些奇怪。由于这种种原因，今日青年把读古书，尤其是先秦之书，视为畏途。其实，先秦书也有难有易。《孟子》便较容易，《战国策》也不很难。纵是艰难的，一般有各种参考书甚至译注本，由此入手，崎岖的山路也可以变为平直的大道。

由于古今声音的不同，古人喜欢用这一同音字代替那一同音字，甚至声音相近的字也可以互相通用，其实是古人写别字，却叫做“假借”，因之学点古音韵学是有好处的。古人字义词义也和今天大不一样，古人用词不但义有引伸，而且有代替，如以“木”代木制品，多指棺槨之类，如《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季隗的话：“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则就木焉”；又如《孟子·公孙丑下》“木若以美然”都是。因之学点训诂学和修辞学也是有好处的。有些关于古文的注释只说这词这句怎么讲解，却未必说出为什么这样讲解。有关这类知识，不但知其然，而且可以知其所以然，甚至于可以判断注释的正误。

先秦叙事短文的上乘之作——《礼记·檀弓》

以上把先秦文学概貌勾勒了一下，下面谈谈“经书”中的“礼书”。“三礼”由于是记载古礼的书籍，一般说来，文学价值不高，但也不能一概而论，比如，《礼记》之中就有一些很好的叙事短文，只是常常被人们所忽略。我翻阅了一些流行的讲文学史的书籍，也翻阅了若干古

文选本，除《古文观止》极少数书外，很少选有《礼记》（以前的选本偶然选出《礼记·记运》“大道之行也”一段），更少选有《礼记·檀弓》。我认为，先秦叙事短文，以《檀弓》为上乘，正如长篇叙事文以《左传》为高一样。檀弓是鲁国人，懂礼仪，因其作品也叫《檀弓》。我们不必论古礼的是非，但无妨欣赏其叙事方法。现在选几段以供大家欣赏。

（一）《晋献公节》

晋献公将杀其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谓之曰：“子盖言子之志于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伤公之心也。”曰：“然则盖行乎？”世子曰：“不可；君谓我欲弑君也，天下岂有无父之国哉？吾何行如之？”使人辞于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以至于死。申生不敢爱其死。虽然，吾君老矣，子少，国家多难。伯氏不出而图吾君——伯氏苟出而图吾君，申生受赐而死。”再拜稽首乃卒。是以为恭世子也。

这百多字短文，活画一位宁肯自杀而关心国家的恭顺太子。事情的原委这样：申生本是晋献公太子（即“世子”），晋献公，晚年宠爱驪姬，驪姬便诬陷申生说他企图毒死君父。重耳是申生异母弟，先劝他表白剖析，申生不肯。又劝他逃亡，也不肯。自杀前，使人向其傅狐突告别希望他关心国家。在此前，狐突曾劝申生出走，所以申生说“不念伯氏之言”。

文章的“盖”即“盍”，“何不”的合音字。“盖言”“盖行”即“何不言”“何不行”。“爱其死”的“爱”，吝惜也。这一段文章，《左传·僖公四年》也有，但没有辞于狐突一段。现把内容相同的录于下，以资比较：

或谓太子：“子辞，君必辨焉。”太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饱。我辞，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乐。”曰：“子其行乎？”太子曰：“君实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谁纳我？”十二月戊申，缢于新城。

两相比较，（一）太子答复剖析的劝告，《左传》用字二十三，《檀弓》用字十三，少于《左传》十字。而且《左传》“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饱”用字十，《檀弓》仅用“君安驪姬”四字，只有《左传》的五分之二，而所指不仅“居”和“食”，包涵一切生活和心理状态。《左传》已精练，《檀弓》更加简赅。（二）太子答复逃走的话，《左传》作：“君实不察其罪，

被此名也以出，人谁纳我？”完全从自己的角度考察。《檀弓》“君谓我欲弑君也，天下岂有无父之国哉，吾何行如之？”便得体而堂皇。

(二)《曾子寝疾病节》(又作“曾子易箦”)

曾子寝疾病，乐正子春坐于床下，曾元、曾申坐于足，童子隅坐而执烛。童子曰：“华而睨，大夫之箦与？”子春曰：“止！”曾子闻之，瞿然曰：“呼！”曰：“华而睨，大夫之箦与？”曾子曰：“然；斯季孙之赐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箦！”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变，幸而至于旦，请敬易之。”曾子曰：“尔之爱我也不如彼。君子之爱人也以德，细人之爱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毙焉斯已矣。”举，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没。曾子病危卧床，学生乐正子春在床下坐着，两个儿子坐在病人脚边，一个童子拿着火把(古代的烛)坐在犄角。古代礼，士不能死在大夫用的席上，曾子所睡的竹席华丽而光滑(睨音缓)，童子便提出疑问。子春禁止他再说，可是童子因为曾子吁了一声，又说一遍。曾参说：“对。这是季孙送的，我没有能够换掉它。”便叫曾元起来换席。曾元答说：“您病得很厉害，目前不能动，到明早，我们好好换掉。”曾参说：“君子以德爱人，小人以苟且偷安爱人。我只要不违礼而死便够了。”自己努力爬起，大家扶他起来，换了席子，仍然睡下，没睡好便去世了。

这段小品，只叙情况和言语，没有作者的描写，而曾参父子、学生、童子的神态和心情栩栩如生。子春只一个“止”字，曾参只惊骇地说一个“呼”字，便表示他虽没听明白童子的话，却感触到是讲竹席。童子的遵循礼节胜于学生和儿子，终于使曾参“得正”而终。

(三)《子夏丧子节》：

子夏丧其子而丧其明，曾子吊之，曰：“吾闻之也，朋友丧明，则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无罪也——”曾子怒曰：“商！女何无罪也？吾与女事夫子于洙泗之间，退而老于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于夫子，尔罪一也。丧尔亲，使民未有闻焉，尔罪二也。丧尔子，丧尔明，尔罪三也。而曰‘——’，女何无罪与？”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过矣，吾过矣。吾离群而索居，亦已久矣。”

这一段写曾参发怒的神态仅从其言语而缓急便足以了解。子夏死了儿子便瞎了眼睛，依古礼，朋友失明便去哭。子夏也哭，却喊天呼冤，曾子不等他说完，便抢着骂他，而且越骂越有气，越有气自说得越急越快，以至于不把话说圆通。何以知道呢？他首直呼子夏之名“商”，这于古礼是很不客气的，数他第一罪，话较和缓，从“吾与女”到“于夫子”共用字二十九，数第二罪，只用九个字，数第三罪少到六个字，可见他越说越急。最后应该说“而曰‘女无罪’，女何无罪与？”又把‘女无罪’三字没说出，尤其可见曾参怒得连话都说不全了。又怎样知他是抢着子夏的话来责备呢？因为子夏说“予之无罪也”是一句没有说完的话。“予无罪也”是完整句，语法和意义都是明白的。若在主语和谓语之间加一“之”字便不是独立的句子而是分句（复合句的一部分）。譬如“花好”是一句，若说“花之好”便不成句。“予之无罪也”不成句，自有下文，“因曾子怒曰”，子夏便不能说下去，由此足知曾参是抢着说的。作者对这些“不着一字”，读者自可以默会神领，得其“风流”。

（四）《孔子蚤作节》

孔子蚤作，负手曳杖消摇于门，歌曰：“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当户而坐。子贡闻之，曰：“泰山其颓，则吾将安仰？梁木其坏，哲人其萎，则吾将安放？夫子殆将病也。”遂趋而入。夫子曰：“赐！尔来何迟也！”（下略）

孔子清早起来便在门口闲散歌唱，唱完，又当室门而坐，那是他希望有人来，而且焦急地盼望人来。子贡听到歌声，仅仅说了几句话，便“趋而入”，可说很快了，而孔子还责他“尔来何迟也”。作者不写孔子的孤独感，而其神情自然流露。

《檀弓》的短文中，小故事仅占极小部分，无不精练有致。就是其他叙说仪节部分，也简短明白。《世说新语》有很多这类小品，只是时代不同，语言变化，其行文的精约有神，读者比较容易体会。两者都可以看各个时代精神。一个雅淡隽永，尚清谈，宗玄学；一个惜墨如金，讲仪节，重实践。可惜后人喜爱《世说新语》的多，讨论《檀弓》的少，是由于时代相去更远，古礼早已被抛弃的缘故罢。古礼虽然早被抛弃，而《檀弓》文章的优美还是应该列入先秦文学范围的，因此略加介绍。

先秦学术思想漫谈

(兼谈我的自学)

梁 漱 溟



梁漱溟 1893年生于北京，曾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民主同盟发起人之一，现任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主要著作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乡村建设理论》、《中国文化要义》、《人心与人生》等书。

中国古代学术思想最发达、最兴盛的时期，是春秋战国时期。那时产生了很多的学派，就是所谓的诸子百家，他们的思想很活跃，每家都有自己的学说、主张，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儒、墨两家，据说在孔子、墨子死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号称“世之显学”。《韩非子》中的《显学》篇，记载了儒、墨两家的这些支系，但是我们今天已经无法知道这些支系的区别了。不过，从文中的记载，还可以想见当时学术思想的繁盛。

造成这种繁盛，我认为下面两个原因是很重要的，一是平等的观念，一是对现实的重视。为什么要强调这两个原因呢？我想通过和西方社会作些比较来说明。

欧洲的中世纪，是农奴制社会，处于社会上层的贵族，兼有地主和领主两重身份，对于土地，他们是地主，对于农奴，他们是领主。也就是说，他们不仅占有土地，而且对于农奴有一定的人身占有权。在那样的社会，农奴隶属于农奴主，是没有什么人身自由的，即使逃出了庄园，也不能就此获得人身自由，主人还有权把他们追捕回去。只有逃到自由都市一年以上未被抓回，才能具有自由民身份，但在漫

长的中世纪，这种机会是不多的。由于人身自由被剥夺，人们的聪明才智也难得以发挥，既不能创造丰富的物质财富，推动物质文明的发展，更不能造就繁盛的精神文明。所以，欧洲的中世纪，社会发展是很迟缓的。只是到了后来，农奴逃走而获得自由民身份的逐渐增多，自由都市兴起，出现了文艺复兴，才开始有西方近代社会文明。中国的情况则不同，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平等的观念，四书五经中都很有平等的气息，象孔子所主张的“仁”，《春秋谷梁传》中的“民者君之本也”，孟子所说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上》）等等。至于所谓“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并不是孟子的创造发明，而是自古相沿的老话，说的是社会分工，一部分人从事脑力劳动，一部分人从事体力劳动，分工易事。由于当时处在具有平等气氛的社会中，人们才能自由地阐发自己的见解，特别是那些创立了一套学说、怀有治国之策的文士，更受到特殊的礼遇和尊宠，有条件继续研究、发展并传播他们的思想学说。当时各学派之间的争辩，也是在平等、相互尊重的前提下展开的，对于学术的繁荣，也起着促进作用。庄子在自己学说的对立面惠施死后，说“吾无以为质矣，吾无与言之矣”，正是根源于此。所以我要说平等的观念是学术思想繁荣的一个重要条件。

从另一方面看，古代欧洲宗教的势力很大，一段时期内，教皇的权力甚至在国王之上。在宗教思想的影响下，人们盼望早日进天堂，去见上帝，而把眼前的生活看作是一种苦难，是通向天堂的一个过渡，所以他们贱视人生，厌弃现实生活，对世上的一切，都归结为上帝的安排，不去探索和研究。在这样的社会风气之下，学术思想很难发展。直到文艺复兴之后，才把这种风气扭转过来，开始注重现实，要求现实生活的美好，才有了近代文明。中国古代则没有宗教，人们的注意力不在生死鬼神方面，如孔子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他们对于现实倒是予以了极大的重视，诸子十家中，大多都明显地表露出积极入世的倾向，儒家的仁政，法家的尚法，墨家的兼爱，纵横家的游说，农家的君臣并耕，都是针对国家的统治、社稷的安危提出的见